

· 热点研讨: 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 ·

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推动的 中朝军队联合作战

王志军 王利鹏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国防大学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

摘要: 抗美援朝战争中,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之间相互配合,成功地进行了两军联合作战。在联合指挥机构建立、联合作战行动展开、联合后勤保障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为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着重从中朝军队联合指挥实现的背景、联合指挥机构的建立过程、联合作战的组织实施、联合作战的政治基础等方面,梳理毛泽东对中朝两军实现联合作战的战略指导,总结其中遇到的矛盾问题和成功经验。

关键词: 抗美援朝 中国人民志愿军 朝鲜人民军 联合作战

中图分类号: K27; E2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451(2020)05-0022-15

Mao Zedong and Sino-Korean Army Joint Operations during War to Resi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Wang Zhijun Wang Lipeng

(National Security School,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91;
Graduate School,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91)

Abstract: In the War to Resi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the Chinese Peoples Volunteers and the People's Army of Korea cooperated with each other and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joint operations. They exercised fruitful practic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joint command organizations, the application of joint operations and the joint logistic support,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winning the war.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joint command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Korean armed forces,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ment of the joint command organizations, the implementation of joint operations and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joint operations. It describes Mao Zedong's strategic guidance to the Chinese and Korean armies in realizing joint operations, and then summarizes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they encountered and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they had in the process.

Key words: the War to Resi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the Chinese People's Volunteers; People's Army of Korea; joint operations

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之间的联合作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军队与外国军队进行的唯一一次境外联合作战。在毛泽东推动下,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密切配合、协

作者简介: 王志军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

王利鹏 国防大学研究生院 少校。

调一致,在运动战和阵地战阶段的多次战役行动中成功地实施了联合作战,为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几十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抗美援朝战争以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运用进行了多角度研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但从毛泽东对中朝军队联合作战指导的角度进行研究相对较少。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国家利益的不断拓展,中国军事力量“走出去”已逐渐成为常态,未来与外军实施海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显著增加。在这种背景下,系统梳理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毛泽东对中朝军队联合作战的指导,总结其中的宝贵经验,不仅可以丰富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朝军队联合作战领导体系的建立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援助邻国的反侵略正义战争,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境外用兵。在定下出兵决心的过程中,毛泽东考虑到未来可能的入朝作战问题,决定加强与朝鲜方面的高层沟通,以掌握战场情况。针对志愿军入朝初期与人民军配合作战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指导志愿军指挥员与朝鲜领导人耐心磋商,在较短时间内顺利解决了指挥权归属、联合指挥机构组建等重大问题,并通过创造性地召开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推进了作战思想统一,为实现中朝两军联合作战创造了条件。

(一) 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前,中朝两国之间逐步建立起战略沟通渠道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密切关注战局发展,及时做出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决策。为了准确掌握朝鲜战场的形势变化,毛泽东等领导人决定加强与朝鲜方面的沟通,以建立顺畅的高层联络渠道。

1950年6月30日,周恩来约见原定派往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馆工作的柴君武^①,并嘱咐说:朝鲜打起来了,杜鲁门政府不仅宣布派兵入侵朝鲜,侵略台湾,而且对进一步侵略亚洲作了全面部署。他们把朝鲜问题同台湾问题和远东问题连结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派人同金日成同志保持联系。倪志亮大使还在武汉养病。现在你带几个军事干部以使馆名义先去。^②7月8日,周恩来接见即将赴朝鲜的柴君武一行,并强调: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是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③当晚,柴君武一行离京奔赴平壤。此后,中国驻朝使馆成为两国高层之间沟通的重要渠道。

7月12日,朝鲜人民军副总参谋长李相朝到达北京。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了李相朝,听取其朝鲜战争情况的通报。这是朝鲜人民军高层第一次正式向中国方面通报情况。^④13日,中共中央正式做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为了提前了解和熟悉朝鲜战场形势,东北边防军特种兵负责人万毅等指挥员向中央军委请示,建议派10余人组成观察队,到朝鲜前线作实地了解。但毛泽东强调“军委原则上同意你们组织观察队到朝鲜前线去作实地考察,但须俟外交部与朝鲜大使交涉,并须斟酌去的时间,避免过早暴露目标。此项时间由军委决定示知。”^⑤随着东北边防军各部队部署到位并加紧进行入朝作战各项准备,提前对朝鲜战场进行勘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日益凸显。8月27日,第13兵团领导人邓华、洪学智给中央军委报告说“兹选定兵团侦察科长崔醒农、

^①柴君武此后被任命为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1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51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55页。

^⑤《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66页。

第四十军第一一八师参谋长汤景仲、第三十九军参谋处长何凌登、炮八师副师长黄登保,以驻朝鲜大使馆武官名义,去朝鲜了解情况。另外,东北后勤是否也派人去,以及去朝鲜与大使馆接洽手续等,均请速示。”毛泽东当日即批复给周恩来“请令这些人和柴君武一同来京,由你面授机宜,然后去朝工作。”^①

9月7日,柴君武从平壤返回北京,先后向聂荣臻和周恩来汇报了所了解的朝鲜战场形势。毛泽东在柴君武呈送军委的《目前朝鲜战争局势报告提纲》上批示:十三兵团同柴去的几个人是否要其来京与柴君武一道面授机宜,请周恩来酌定。柴君武等出发之前,似应约李周渊^②大使一谈,告以柴君武等任务,征求金日成的同意,俟得同意后方能出发。^③可见,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于提前派人到朝鲜境内勘察、了解战场情况是极为重视的,但考虑到对朝鲜主权的尊重和保密问题,又较为慎重。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随后急剧恶化。9月20日,周恩来约见柴君武,要他尽快偕张明远、崔醒农、何凌登、汤敬仲、黎非等5人,以武官名义前往朝鲜勘察地形和深入了解战况。^④从10月初开始,在朝鲜正式向中国提出出兵请求后,中共中央多次开会进行集体研究,反复权衡出兵或不出兵的利与弊。同时,中国方面进一步加强了与朝鲜的高层沟通。10月3日,周恩来会见来北京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内务相朴一禹,就朝鲜作战的各项问题交换意见。^⑤8日,在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命令的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倪志亮并转金日成,除通报中国的出兵决定外,还请金日成“即派朴一禹同志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二同志会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⑥当晚,朴一禹到达沈阳,向彭德怀通报了敌军情况,希望志愿军迅速入朝,并商谈了志愿军入朝后的有关问题。10月12日,朴一禹向金日成汇报:志愿军将于“10月15日从三个方向越过中朝边界,并于10月20日在预定地区集结”。^⑦

志愿军入朝前夕,中共中央根据所掌握的朝鲜战场形势判断,平壤尚未失陷,朝鲜人民军尚有一定作战能力,能够为志愿军开进争取一段时间。同时,考虑到敌我武器装备对比实际和敌军作战特点,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确定的志愿军入朝初期的作战构想,是在朝鲜北部山区实行防御,首先站稳脚跟,掩护朝鲜人民军恢复战斗力,同时等待苏式装备到达后换装,然后再实行反攻。如果敌军来进攻,则以打韩军为主。在这种战略构想下,虽然中朝军队尚未真正实施联合作战,但中朝两国之间已逐步建立起战略沟通渠道。

(二) 第一次战役后中朝两国高层经磋商建立了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

1950年10月19日晚,志愿军开始渡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司令员彭德怀带电台和少量警卫人员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此前,毛泽东曾数次提议安排彭德怀与金日成直接见面,以尽早掌握和了解战场情况,但由于形势变化而未能实现。直至21日上午,彭德怀才第一次在大榆洞与朝鲜首相金日成见面会谈。此时,平壤已经失陷,朝鲜人民军主力被隔断于三八线以南,其余部队正分散向北撤退,战场形势危急,因此两人的会谈未就配合作战问题形成具体意见。但是,毛泽东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已经改变了原定先期实施防御的战略构想,决定抓住战机,在敌人还没有料到时突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196页。

② 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205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77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83—84页。

⑥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11页。

⑦ 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三卷(1950.8—1951.8),上海:东方出版社,2015年,第95页。

然发起战役反击。因此,中朝两军实施联合作战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其中尤为关键的是建立联合指挥机构的问题。10月24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里,就组建志愿军司令部的问题专门提出“除中国同志外,请与金日成同志商量,以一个朝鲜同志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或者以一人作为副司令员,一人为副政委。”^①25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第13兵团指挥机构为基础,改组成立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及相关机构,并任命朴一禹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党委副书记,以协调中朝两军作战行动。^②此时,志愿军已发起第一次战役,刚刚成立的“志司”还不具备直接指挥和协调朝鲜人民军行动的职能。因此在战役进程中,中、朝军队之间不仅无真正配合,反倒由于信息沟通不畅,发生了误击事件。11月4日,志愿军第39军受到朝鲜人民军坦克师的误击,导致被志愿军围攻的美军第24师得以逃脱。另外,在需要朝方配合的物资供给、交通运输保障等方面,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这些情况表明,为了保证战争的顺利进行,仅在志愿军统率机关派驻朝方代表是不够的,需要尽快建立更为有效的两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尽管第一次战役取得了胜利,但两军在作战和保障方面配合不力的现象引起了毛泽东和志愿军指挥员的高度关注。战役结束后,彭德怀提出让人民军总部靠近志愿军总部,以便于统一两军行动。11月7日,彭德怀请朴一禹面见金日成,就开辟敌后战场、中朝两军配合作战、俘虏处理等问题进行协商。11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高岗,提议由金日成、什特科夫(时任苏联驻朝大使)、彭德怀组成三人指挥小组,统一负责中朝两军指挥。对于这一系列建议,14日,金日成在与彭德怀、高岗和什特科夫就中朝两军统一指挥与行动的有关问题进行了会谈。^③

对于中朝两军的指挥权问题,毛泽东极为重视。11月12日,在给彭德怀的复电中,毛泽东专门强调“关于与朝鲜同志合作的各项意见都是适当的。商谈时请注意方式,采取委婉曲折的与温和的态度。并要有这样的精神准备,即有些意见通不过,争论和分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着,要待打了很多的胜仗,中国同志的意见在事实上多次证明是正确的,那时才会被朝鲜同志所赞同和信服。”^④13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支持彭德怀提议的三人小组方案,并表明“我们同意这个提议,现特电告,请求您的指示”,“现在重要问题是朝、苏、中三国在那里的领导同志们能很好地团结,对各项军事政治政策能取得一致的意见……”^⑤16日,斯大林在回信中表示,“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⑥。金日成对于中朝两军联合作战的指挥权问题也明确表态。24日,金日成在与什特科夫的会谈中表示,他同意建立联合司令部,并决定派朴宪永^⑦去向毛泽东当面详细通报有关情况,并协商有关中朝军队统一指挥问题。^⑧12月1日,金日成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明确表示,同意中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287页。

②《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152页。

③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三卷(1950.8—1951.8),第120—123页。时任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认为,“金日成在自己的发言中故意回避了关于中朝军队作战中的从属关系问题”。当时,彭德怀提出,“金日成、什特科夫和他(彭德怀)本人应当经常开会,以便就作战问题有关问题进行讨论”;高岗在谈到中朝两军最高指挥机关协同作战问题时,指出“有必要考虑一下双方合作的模式问题”;什特科夫也指出,“部队的作战行动应当有一个统一指挥机关”。但是当时,金日成都没有明确回复,所以,高岗和彭德怀宣布,关于统一指挥的问题可以在第二次战役之后再作决定。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40页。

⑤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604页。

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15页。

⑦时任朝鲜外务相兼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

⑧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三卷(1950.8—1951.8),第132—134页。在此份电报中,金日成表示,“曾经责成朴一禹与彭德怀协商过关于成立联合司令部的问题”,但彭德怀“并未做出任何肯定的答复”,并且对担任副司令的人选也没有太好的选择,他“真不知如何是好”了。

朝两军统一指挥,认为“最高司令员无疑应当由中国人来担任”,并决定亲自前往北京与毛泽东会面^①就两军协调行动的一系列问题展开具体磋商。这样,中朝双方在统一指挥问题上达成初步共识,为实现两军联合作战扫除了主要障碍。

12月3日,金日成抵达北京,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就朝鲜战争的相关问题进行会谈。在统一指挥问题上,中朝双方决定:成立不对外公开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以统一指挥两国军队作战和前线的一切活动;联合司令部下属两个机构,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和朝鲜人民军参谋部,合驻一处办公;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朝方金雄^②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③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中朝双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司令部的协议,就作战指挥、交通运输、后勤支援、新闻报道等问题进行了明确。^④在最终征得朝鲜政府同意之后,该协议成为指导中朝两军建立联合司令部、实施联合作战、协调解决分歧等的重要依据。这也标志着中朝两军实施联合作战有了政治依据和法律基础。12月上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正式组成,简称“联司”。

(三) 中朝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统一作战思想

中朝双方尽管就联合作战的指挥问题基本达成一致,但对于战场形势判断、战略指导、作战思想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分歧。尤其是第二次战役之后,中朝双方在是否应该继续南进、乘胜追击的问题上看法不尽一致。朝方对志愿军停止进攻的做法不太理解,并提出不同意见。究其原因,在于两军之间仍然缺乏深入了解和相互信任。这一问题不解决,必将对两军联合作战的实施产生不利影响。

第二次战役胜利后,彭德怀根据战场实际和部队状态,命令停止进攻,不做过远追击。当时朝方和苏联驻朝大使不了解情况,提出了不同意见。^⑤毛泽东也根据国际政治形势需要,提出志愿军“必须越过三八线”^⑥,但同意彭德怀全军主力均应后撤休整的计划,并电告彭德怀、朴一禹、金日成和高岗,“在此次战役(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均应撤退至利于休整的适应地区,休整一个月至两个月”。^⑦第三次战役发起后,“联合国军”有计划地主动后撤,使中朝军队未能实现大量歼敌的目的。1951年1月3日,彭德怀电告金日成,拟决定部队在占领汉城等地之后即停止前进,转入休整补充。^⑧7日,中朝各部队遵令停止追击。^⑨但苏联和朝方有的同志对此不理解。

1月10日,金日成在志愿军司令部,与彭德怀进行会谈。彭德怀向金日成详细解释了停止进攻的原因。彭德怀谈到,经过连续三次战役,志愿军减员巨大,后勤补给和运输也愈发困难,“人员极不充实,极需补充休整”,“我应进行充分准备,求得下一战役消灭更多敌人”强调,“志愿军必须休整两个月,才能对敌发起攻势”。^⑩

①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三卷(1950.8—1951.8),第141—143页。

②时任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部司令官。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55页。

④《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122—123页。

⑤王焰《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56页。

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39页。

⑦《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249页。

⑧王焰《彭德怀年谱》,第464页。

⑨王焰《彭德怀年谱》,第465页。

⑩王焰《彭德怀年谱》,第466页。

1月15日,毛泽东将1月14日致彭德怀并转交金日成的电报转发斯大林,再次提到“在最近2—3个月内,中国志愿军和朝鲜军队要克服严重困难,并完成繁重而艰巨的工作”,“只有做好这一工作,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如果遇到敌军的顽抗,不进行很好的准备,“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月至9月所犯过的错误”。^①

从对第三次战役后志愿军是否应转入休整的不同看法上,反映出,尽管中朝两军已经建立起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但如果在战略判断和作战思想等问题上达不成统一认识,仍然会妨碍两军联合作战,甚至会因矛盾激化而影响战争进程。

1951年1月8日,彭德怀向中央提议,拟召开一次中朝两军高级干部会议,以求在重大问题上统一双方的思想认识。^②而第三次战役结束后的这场激烈争论,也使朝鲜领导人意识到双方进一步加强了解和增进彼此互信的重要性。1951年1月11日,金日成结束与彭德怀讨论后,同意了中方提出的关于召开中朝两军高级干部会议的建议。毛泽东对开好这次会议高度重视,他在彭德怀主持起草的《三个战役的总结和今后任务》报告稿上做出重要批示,并特意指示彭德怀,“请事先送金首相阅正,商得其同意”。^③

1月25日,中朝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在志愿军司令部所在地君子里召开。除中朝两军高级指挥员外,金日成、朴宪永等朝鲜劳动党中央主要负责同志,中共中央特派的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兵团司令员陈赓也都参加了会议。彭德怀做了主报告,在全面总结战役胜利意义的同时,还专门阐释了不做过远追击的原因,也指出了部队在战役、战术上存在的问题。在报告最后,彭德怀还特意讲到向朝鲜劳动党和人民军学习的问题,“……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的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④通过这次会议,中朝双方不仅总结了前三次战役的胜利经验,明确了下一步的作战任务和方针,而且统一了双方的作战思想,消除了误解,增进了两军的团结互信,为接下来发动新的战役作了最直接的思想动员。

二、中朝军队联合作战的实践探索

中朝联合司令部的建立和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两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初步建立。从第三次战役开始,中朝军队在“联司”统一指挥下实施作战,两军配合程度逐步加深。随着战场形势的发展以及作战形式的调整,在毛泽东指导下,两军联合作战领域也不断拓展,相继实现了联合空中作战、联合铁道运输、联合抗登陆作战、联合游击作战等,联合指挥体制的运行也更加顺畅高效,为最终赢得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中朝两军在统一指挥下实施地面作战

中朝联合司令部成立后,虽然两军联合作战有了组织保证。但是,两军联合作战实施中仍有一些具体问题需要双方领导人经过进一步磋商和沟通才能达成一致。1950年12月6日,彭德怀急电毛泽东,“今晚(金日成)由驻地启程”“到大榆树志愿军司令部,会谈组成中朝联军司令部和

①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三卷(1950.8—1951.8),第202页。

②王焰《彭德怀年谱》,第465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85页。

④《彭德怀军事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66—369页。

联司领导干部配备问题”。^① 当日晚 10 时,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宋时轮,并请彭将此电转金日成,“……方虎山军团^②应速向南朝鲜出动,……在九兵团附近的朝鲜第三军团应受宋时轮同志指挥,……此点请金日成同志对第三军团下达命令。……在江界地区及定州地区集中的人民军两个军团,请金日成同志速令其接受彭德怀、金雄、朴一禹三同志的指挥,随志愿军一起向平壤以南出动,配合志愿军作战”。^③ 7 日,彭德怀与金日成在大榆树志愿军司令部就两军配合作战的细节进行协商,“金(日成)同意组成联合指挥部,今后不再直接干预指挥。已商定人民军第三军团配合九兵团作战”。^④ 此后,朝鲜人民军在联合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开始直接配合志愿军作战。

1950 年 12 月 31 日,中朝军队发起第三次战役。此次战役,中朝军队首次在“联司”统一指挥下实施作战。中朝参战部队分别为:志愿军的第 38、39、40、42、50、66 军,约 23 万余人;朝鲜人民军第 1、2、5 等 3 个军团约 7.5 万余人。战役发起前,彭德怀、洪学智、解方下达部署命令,将志愿军一线 6 个军由东到西编成左右两个纵队。其中,以第 42 军、第 66 军为左纵队,统由第 42 军军长吴瑞林、政治委员周彪指挥,并特别强调,以第 66 军 1 个师与杨口、麟蹄人民军第 2、第 5 军团密切联系,策应人民军该两军团南进攻击;以第 38、第 39、第 40、第 50 军为右纵队,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统一指挥;令人民军第 1 军团一部位于海州警戒,主力由开城地区向汶川之敌进行宽正面佯攻,钳制该敌,配合志愿军右纵队作战。^⑤

战役发起后,志愿军左右纵队和人民军按照预定计划迅速突破敌人前沿阵地,迫敌撤退。按照战前对战局形势发展的预测,在美军弃汉城南逃后,志愿军第 50 军经议政府、人民军第 1 军团经汶山向汉城(今首尔,下同)追击,并由第 50 军抢占汉城江桥,由人民军第 1 军团担任汉城城防警戒。1951 年 1 月 4 日下午,志愿军第 39 军第 116 师和人民军第 1 军团占领汉城。与此同时,人民军第 2、第 5 军团在志愿军左纵队第 42 军主力、第 66 军 1 个师配合下,继续向洪川、横城方向截击南逃之敌,并伺机占领春川、洪川、横城、襄阳、江陵。

此后,为了扩大战果、巩固汉城,志愿军和人民军继续向南挺进,逼近三七线。在西线,志愿军第 50 军和人民军第 1 军团在志愿军第 116 师 1 个团的掩护下,渡过汉江。其中,第 50 军过江后向水原攻击前进;人民军第 1 军团随后过江,先后占领金浦、仁川港。在东线,由于未受到敌人过多抵抗,志愿军左纵队各部先后进占砥平里、杨平、骊川、利川和洪川等地;人民军第 2、第 5 军团也先后占领原州、横城。为了避免前进过远陷于不利,1 月 8 日,全线停止战斗,第三次战役胜利结束。

这次战役,是中朝两军在联合指挥下进行的首次战役,战役部署和实施实现了协调统一。特别是针对敌人伪军在前、美军在后的特点,结合人民军刚刚休整补充完毕的实际,中朝“联司”指挥员有意让人民军分置志愿军两翼,担任战役支援任务。人民军第 1 军团在完成对汉城、仁川港、金浦机场等重要目标占领任务的同时,也在攻占汉城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军第 2、第 5 军团在东线实施大纵深迂回穿插任务,在战斗中有效威慑敌人侧翼,迫敌溃散,发挥了重要牵制作用。从战役指挥流程看,部署命令从“联司”分别到志愿军司令部、人民军司令部,再各自下达至所属部队。^⑥ 从战役行动过程看,两军作战实现了全局的战役协同,积累了联合作战指挥和行动的初步经验。

①王焰《彭德怀年谱》,第 465 页。

②指朝鲜人民军第五军团,军团长方虎山。

③《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 399 页。

④王焰《彭德怀年谱》,第 453 页。

⑤在 22 日的部署命令中,令第 5 军团及第 2 军团一部由杨口、麟蹄、阴阳里、富坪里东西线韩国第 1、第 2 军团结合部攻击,得手后相机向洪川进攻。见彭德怀传记编写组《彭德怀军事文选》,第 357—358 页。

⑥参见周恩来起草的《中朝两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的协议》第三条,《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 122—123 页。

1951年1月2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集中兵力开始反扑,中朝军队随即决定以运动防御的形式发起第四次战役。战役期间,朝鲜人民军首次直接配属志愿军实施联合作战。2月1日,“联司”根据战场态势,决定把一线部队划分为3个作战集团,从东到西分别由邓华、韩先楚、金雄负责指挥,依次简称邓指、韩指、金指。战役第一阶段,为了配合东集团(邓指)实施横城反击战,根据“联司”指示,人民军第1军团首次直接配属志愿军,统一由韩先楚指挥,与志愿军第38军、第50军共同担负西线的坚守防御任务。在这一阶段,志愿军第50军与人民军第1军团交替掩护,联合实施了较为成功的机动防御。2月5日,为了缓解志愿军第50军防御正面的压力,“联司”命令人民军第1军团接替南泰岭、果川、军浦场一线以西14公里原志愿军第50军的防御任务。2月8日至2月18日,志愿军第50军第450团及第448团和人民军第1军团4个营,又协同配合控制汉江南岸桥头阵地,节节阻击迟滞敌人进攻,掩护主力向江北转移。此时,由于志愿军和人民军已经实现了直接的电话联络^①,因此协同配合显得更加顺畅高效。第二阶段,志愿军与人民军划分梯队、两线配合,层层阻击敌人,大量消灭敌有生力量,实现战役协同,成功掩护了志愿军第二番作战部队向预定地域开进和展开,为实施第五次战役创造了条件。

1951年4月22日,中朝军队发起第五次战役。战役期间,中朝兵团级指挥员首次共同实施指挥。战役第一阶段,中朝军队全线攻击,再次突破三八线。战役第二阶段,中朝军队将主要力量东移,以韩军为攻歼目标。其中,东线由志愿军第3兵团、第9兵团以及人民军第2、第5军团担负主要进攻任务,目标是围歼县里地区韩军4个师。进攻发起前,根据“联司”指示,5月8日和9日,第9兵团与东线人民军前线指挥部共同召开了两军联合作战会议,集中讨论了志愿军和人民军各部队的具体部署,并决定由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副司令员陶勇和人民军前线指挥部司令员金雄共同指挥。根据作战部署,以志愿军第3兵团第12军向当面的韩军第5师发起进攻,并以一个加强师进行战役迂回,与人民军第2军团共同形成合钳;志愿军第9兵团第27军与人民军第2军团在长津坪地区形成合钳,阻敌南逃;志愿军第9兵团第20军向韩军第9、第3师发起进攻,与人民军第5军团形成合钳。这一战役布势,体现了对敌三层迂回包围、多钳合拢战法,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战役发起后,志愿军各军与人民军各军团直接配合、密切协同,保证了县里围歼战的重大胜利。这次战役,中朝两军通过在前线召开联合作战会议,首次实施兵团级联合指挥,进一步丰富了联合司令部的指挥机制。

(二) 实现中朝空军联合作战

与地面部队一样,志愿军空军在参战之初也面临着如何与朝鲜空军协同配合的问题。1950年12月下旬,中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同朝鲜人民军航空局局长王琏就两国空军协同作战问题进行了首次磋商,双方一致认为迅速组建中朝空军的联合指挥机构十分必要。1951年1月4日,周恩来在向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在我方空军五个师和朝方空军三个师参战的情况下,中朝双方需要成立统一的联合集团军司令部,并由我方担任司令、朝方为副司令,受中朝联合司令部的直接指挥。”^②为了进一步征得朝鲜党和政府的同意,周恩来于1月7日又电告金日成,“提议按照中朝联合司令部的组织原则,成立中朝空军联合集团军司令部”^③。

随后,在中方的主要筹划和组织下,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的组建工作逐步展开。从1951年1

^①参见1月30日彭德怀、邓华、金雄、朴一禹致电一线志愿军和人民军电报内容。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58页。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抗美援朝大事记(一)》(1965年8月14日),第38页。

^③《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79页。

月开始,在中央军委的全程指导下,空军党委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以空军总部机关一部分人员为主,抽调各军区空军部分人员,组建了中朝联合空军集团军指挥机构。1月16日,毛泽东在审阅空军党委关于“参战各师是否算志愿军”的请示报告里,明确批示“应算作志愿军”。3月5日,中央军委批准了联合空军指挥机构的编组报告,并正式命名为“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简称“空联司”。^①3月15日,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在安东举行成立大会,标志其正式开始运行。3月30日,经与朝鲜方面协商同意,“空联司”正式任命刘震为中朝联合空军司令员,王琏(朝)、常乾坤为副司令员,沈启贤为参谋长,李世安为政治部副主任。5月15日,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党委正式成立,刘震、常乾坤、沈启贤、李世安、王琏等8人为党委委员,刘震为书记。9月19日,中央军委又任命东北空军政治委员周赤萍兼任中朝联合空军政治委员。^②

1952年1月24日,毛泽东在视察空军领导机关时指出,“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抓紧时机进行实战锻炼,要十分重视实战锻炼对空军部队的意义,哪怕求得打几个空战也是好的”。^③此后不久,中朝空军在苏联空军的帮助下,根据各自特点,开始投入实战,担任掩护交通运输线、配合地面部队行动、实施联合登陆作战等作战任务。7月15日,空军联合司令部召开党委会议,进一步明确中、苏、朝三方的作战任务。其中,苏联空军主要负责打击敌机群中的F-86,并担负夜间和复杂条件下的作战任务;中朝空军则主要协同苏联空军集中力量打击敌机群中的轰炸机,同时以部分力量对付敌机中的战斗截击机。^④10月4日,朝鲜空军一个飞行团在刘震司令员的直接指挥下,出动4架飞机低空飞至东海岸连浦上空,与敌海军12架飞机交手,以零伤亡击落敌机5架、击伤1架。7日和11日,该团又在聂凤智副司令员的指挥下,连续两次作战,再次以零伤亡击落敌海军飞机4架、击伤5架。^⑤

1952年12月,为粉碎敌登陆作战企图,中朝空军开始研究制定各机种协同配合地面部队的抗登陆作战计划。1953年1月18日至23日,空军联合司令部司令员聂凤智、参谋长王炳章与苏联顾问、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刘正、志愿军副参谋长王政柱、朝鲜人民军参谋长南日在安东参加作战会议,共同商定空军在抗登陆作战中的任务、使用原则、组织指挥、陆空联络等问题。^⑥2月底至3月初,空军联合司令部又专门集中组织了中朝空军抗登陆战役集训。通过理论学习和实兵演习,各级指挥员更加熟悉和掌握了抗登陆作战的战术和组织指挥方法等,为粉碎敌人的登陆企图做好了充分准备。

(三) 实施铁道运输联合指挥

铁路运输作为志愿军后勤补给的主要方式,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发挥了巨大作用。1950年11月至1951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和中国人民志愿援朝工程总队相继入朝,与朝鲜人民军和朝鲜铁路员工一起抢修铁路、抢运物资,确保铁路输送不间断。但由于中朝双方在铁路运输究竟由谁领导管理这一核心问题上存在分歧,铁路运输效率不高的局面迟迟得不到改善。周恩来曾致电倪志亮即转金日成“提议为适应战争急需,朝鲜铁路必须立即置于统一的军事管制之下”,即“在联司领导下,设立中朝联合的军运司令部,统一朝鲜铁路的管理、运输、修复与保护事宜”。^⑦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抗美援朝大事记(一)》(1965年8月14日)第40页。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抗美援朝大事记(一)》(1965年8月14日)第40—41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493页。

④《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抗美援朝大事记(三)》(1965年8月14日)第313页。

⑤《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抗美援朝大事记(三)》(1965年8月14日)第359页。

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抗美援朝大事记(三)》(1965年8月14日)第426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148页。

为此,在苏联的介入下,中朝双方通过反复沟通,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对铁路运输实施军事管制,并以中方为首对铁路运输实施统一指挥。

1951年5月4日,根据双方协商结果,中朝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对管理体制、组织机构、运力分配、人员构成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并决定通过组建中朝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集中统一管理战时的铁路运输、抢修和防护等。^①根据战场形势的需要,7月12日朝鲜铁道军事管理总局在安州首先成立,东北军区军事运输司令部司令员刘居英为局长兼政治委员,负责统一管理朝鲜境内的铁路运输。^②8月1日,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正式成立,受“联司”直接指挥,由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兼任司令员。^③

当时朝鲜境内铁路运输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协调中朝双方铁路运输需求,使有限的铁路运力优先满足军事用途。根据《关于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铁路运输必须首先保证部队作战的军事运输需求,其余一切未经“联司”特批的运输请求均不予满足。而对于中朝各自的物资运输量,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还规定志愿军与人民军的物资输送比为5比1。而朝鲜国民经济对铁路运输的需求,则需要每月向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提前报送计划,经过“联司”的最终批准才能够予以实施。^④

为监督铁路运输计划的贯彻执行,中朝双方在高层成立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的基础上,又对朝鲜境内的各铁路分局、站、段等进行了集中统一管理,并按照“中正朝副”的原则设置了领导机构,进一步增强了铁路运输管理效率。

为了整合中朝双方的铁路抢修力量,中国铁道兵团和朝鲜铁道复旧指挥局,直接受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的指挥。在具体的抢修工作上,铁道兵团各师团和朝鲜铁道复旧指挥局各联队(大队)均服从铁道军事管理总局及其所属分局等的指挥。^⑤中朝各抢修力量除单独执行某一段线路的抢修任务外,还会相互协同配合共同完成军事运输司令部下达的抢修任务。例如朝鲜第13联队和中国铁道兵团曾各派出一个团,共同负责完成了元罗线南阳到高原线的维修和抢修任务;第14联队和铁道兵团一部作为机动力量,共同负责完成了京元线的机动抢修任务。^⑥

中朝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的成立,重点解决了铁路运输与作战需求相匹配的问题,并通过下设朝鲜铁道军事管理总局、前方抢修指挥所和高射炮兵指挥部等机构,实现了抢运、抢卸、抢修和防空的统一,构建了合作紧密的立体运输体系,保证了铁路运输效率,有力支援了一线部队作战。

(四) 进行东、西海岸联合防御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防备美军从朝鲜半岛东西海岸登陆,始终是中朝双方战略指导上高度关注的问题。毛泽东对敌人可能发起的侧后方登陆和空降尤为关注,“为防敌从元山登陆,似须以四十二军主力位于元山城内及其附近,确保元山”^⑦;“敌人若从中间各地降落伞兵……到处乱窜,抗

^①《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铁路运输类上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29—33页。

^②《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基本经验)》,北京:金盾出版社,1987年,第396页。

^③沈志华《冷战中的盟友》,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204页。

^④参见《关于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铁路运输类上册)》,第29—33页。

^⑤《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铁路运输类上册)》,第31页。

^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铁路运输类上册)》,第27页。

^⑦《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272页。

我后方,此种可能性很大,请速筹对策”^①。“‘联军……可能另组元山登陆部队,以促成共军提早放弃临津江以东地区……此种阴谋应肯定是真实。我全军应振奋精神,加速准备,粉碎正面之敌及从侧面登陆之敌’”^②。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战线趋于稳定,中朝联合司令部逐步调集力量,增强东西海岸防御。同时,为了进一步密切志愿军与人民军在海岸防御上的协调配合,开始组建联合防御指挥机构,统一作战计划和力量配属。

1951年9月21日,彭德怀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致电金日成,提出“成立两联合指挥所统一东西两海岸指挥”的建议。22日,金日成答复彭德怀,同意立即成立东西海岸联合指挥机构。经双方商议,西海岸指挥所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任司令员,人民军第4军团长朴正德兼任副司令员,下辖志愿军第38、39、40、50军和人民军第1、4军团;东海岸指挥所由宋时轮兼任司令员,人民军第7军团长李离法和志愿军第9兵团副司令员陶勇分别兼任第一、第二副司令员,下辖志愿军第9兵团和人民军第7军团。

在西海岸,第一线部队除志愿军第50军外,主要由人民军两个军团、两个海防旅构成;二线部队则全部由志愿军的3个军组成。东海岸防御同样由两线力量组成。其中,第一线除志愿军第16军第47师外,主要由人民军第7军团、海防第24、第25旅组成;二线部队则完全由志愿军的两个军组成。东、西海岸防御力量布势的共同特点,一线以人民军为主,二线以志愿军为主。部队部署调整完毕后,1951年10月4日,东西海岸联合防御指挥所先后召开联合作战会议,研究制定了海岸防御联合作战方案,明确各部队作战任务,并重点对一线和二线的防御工事和坑道进行了加强。

1952年底,“联合国军”在正面战场始终无法突破的情况下,妄图以重兵实施登陆,彻底掌控战场主动。根据这一情况,1952年12月17日,志愿军召开党委会议,决定以西海岸为重点,调整兵力部署和指挥关系,加紧抗登陆作战准备。随后,东西海岸指挥所相继升级为指挥部。其中,东海岸指挥部改由第3兵团司令部兼任,第3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为代理司令员,兵团副政治委员杜义德兼任东海岸指挥部政治委员,人民军前线司令部司令金雄为副司令员,兵团参谋长王蕴瑞兼任指挥部参谋长,兵团政治部主任刘有光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下辖志愿军第12、15军和人民军第2、5兵团;西海岸指挥部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梁兴初、人民军军团长方虎山和志愿军第39军军长吴信泉为副司令员,杜平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政柱为参谋长,主要辖志愿军第16、38、39、40、50、54军和人民军第4军团。

为了密切中朝双方联合抗登陆作战准备,东海岸联合防御指挥部召开了由中朝师以上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统一研究制定了作战计划和协同计划。根据会议精神,处于同一阵地的志愿军和人民军师以上部队,共同制定同一份作战计划,以统一作战思想和行动;在相互配属关系上,通过同一阵地编号和炮火射向,双方炮兵可以对所有反击部队提供火力支援,步兵炮群和迫击炮群可以相互转属指挥;在通信联络上,志愿军与人民军相邻单位间相互架设有线电话、互派守机员,互派电台联络组并统一联络信号;对于战场保障,中朝制定了联合保障预案,伤员可以得到统一救护,同一坑道、同一阵地的粮食和弹药实施统一使用、统一补给。^③正是由于中朝两军在东西海岸抗登陆作战准备中紧密协作配合,严阵以待,迫使“联合国军”最终彻底放弃登陆计划,加速了停战谈判协议的签订。

①《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273页。

②《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289页。

③参见《志愿军与人民军的作战指挥关系》,志司,1953年4月15日。

(五) 共同组建联军游击支队开展敌后游击战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司令部十分重视发展游击战。尤其是在第五次战役结束后,中朝联合司令部为了准备第六次战役特别组建了一支中朝联军游击支队,其任务是深入敌后获取情报、破坏交通、发动群众等,配合正面战场发展。

1951年6月底,中朝联军游击支队正式组建,下辖6个中队。其中,志愿军负责组建第1、2、3、4中队,人民军负责组建第5、6中队。游击支队司令员由志愿军第40军第118师副师长刘振华出任,第42军第125师副师长茹一夫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人民军丁树民和赵宝善分别出任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随后又增加志愿军第26军第77师政治部主任孙良浩为副政治委员^①,人民军的李相模和朴方烈为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游击支队共设有参谋组、政工组、后勤组,并配备了专门的英文翻译和机要员。另外各中队还设有中队长、政治委员、参谋、干事,以及英语和朝语翻译、书记、医生、译电员等。

1951年秋,“联司”决定抽调游击支队执行翁津半岛的剿匪任务。11月下旬,游击支队在信川郡召开军政联席会议,进一步密切了支队内部、支队与附近友军以及支队与地方政府群众的联系。随后,游击支队开始重点对翁津半岛的九月山进行搜剿。在作战部署上,由两个中队负责海岸线防御,防敌偷渡;由两个中队担负进山搜剿任务,并伺机组织更大规模的围剿;其余两个中队作为预备队,组织教育训练并开展群众工作。此次剿匪作为联军游击支队成立以来的首次行动,中朝双方各参战单位合理分工、紧密配合,通过政治争取与武装打击相结合的方式,最终取得了剿灭九月山匪患的胜利。可以说,中朝联军游击支队是志愿军与人民军深化合作的一个重要缩影,其低层级、高融合的特点,表现出两军之间的高度熟悉和信任。另外,其不同于一般游击支队的特战性质,更凸显出极强的战斗能力和生存能力。

三、中朝军队联合作战的政治基础

志愿军出国作战,如何争取朝鲜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如何不断增进与人民军的互信与团结,这是过去国内战争中从未遇到的课题。而解决这一课题的关键,就在于发挥人民军队的政治优势,争取朝鲜人民的充分支持。毛泽东从志愿军入朝初期就强调要发扬遵纪爱民的光荣传统,注意在各方面关心和爱护朝鲜人民,以严格的纪律维护军政、军民团结。同时,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学习朝鲜人民军有益的经验,通过密切两军交流增进了解、加强团结。在毛泽东指导下,中国政府和志愿军官兵以实际行动获得了朝鲜人民及其军队的信赖,从而使这场战争成为两国、两军共同进行的一场人民战争,最终赢得了辉煌的胜利。

(一) 从志愿军参战之初就注意加强教育,尊重和团结朝鲜党政军民

在1950年10月8日发布的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毛泽东就特别强调,“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②为此,志愿军在出国之前,还专门在全军进行了出国作战的政策和纪律教育,使得尊重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军的思想基础初步得到确立。1950年12月14日,志愿军发布的《政治训令》中明确指出,我军入朝的政治任务,“一个是打好仗,一个是搞

^①黄力民《中朝联合游击支队的中方副政治委员考证》,《兰台世界》2020年第1期(上)。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235页。

好群众纪律,两者又是一个总的目的,即为了朝鲜人民的利益。”^①为了进一步强化志愿军官兵尊重朝鲜党政军群的思想认识,毛泽东在审阅彭德怀的《三个战役的总结和今后任务》时,曾专门加写了一段文字“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这是胜利的政治基础。”^②

此后,尽管通过制定合作协议和召开联席会议,中朝已经就联合作战问题达成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但要确保中朝双方能够坦诚而持久地维护好联合作战关系,仍然需要不断营造团结氛围。第三次战役开始之前,毛泽东曾特别强调,要“改善中国同志与朝鲜同志的关系(那些以恶劣态度对待朝鲜同志的人们应受到严格批评,重者应予以撤职处分),改善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居民群众工作(包括帮助受难人民解决一部分物质困难)”。^③因为“志愿军和朝鲜人民的团结问题,不仅是军民关系问题,而且是两个国家的团结问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问题;是中朝两国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胜利的根本问题。对这一问题,如果处置失当,就会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胜利”。^④

志愿军还利用战斗间隙,尽一切可能积极帮助朝鲜人民克服困难。据不完全统计,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帮助朝鲜人民开荒耕地、播种插秧、除草收割 45 万担,掘井 167 眼,修桥 7565 座,修盖房屋 11900 多间,修水渠 330 多公里,修堤坝 40 多条。^⑤为了减轻朝鲜人民的战争负担,“冬季行军,战士每人负重七十余斤,到达宿营地已十分疲劳,但仍尽量不住民房,经常在山坡上或雪地里露营”;尊重朝鲜人民的生活习惯,“上炕脱鞋,还帮助房东打柴、担水、割草、喂牛、推磨、起粪、打扫院子”;“还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中朝两国文字写好贴在墙上、路边”,接受群众监督。^⑥正是由于中国军队优良的传统和富有成效的教育,使得志愿军在入朝后很快就赢得了朝鲜政府和人民的拥戴。

(二) 妥善处理涉及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敏感事务 坚决抵制不良行为

志愿军入朝之初,由于有些入伍不久的战士觉悟不高,对群众纪律重要性认识不足,违反了群众纪律,损害了志愿军声誉,伤害了中朝人民友谊。^⑦1950 年 12 月 3 日,毛泽东同金日成的谈话中,特别提出“我们要求中国人民志愿军要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金首相,拥护朝鲜人民政府,爱护朝鲜人民军,要搞好双方关系。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般纪律是好的,但最近仍查处十多件破坏纪律的事,前方已决心严办,并向当地人民认错。”^⑧志愿军进入朝鲜严禁使用人民币,但“有的同志认为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没有认识到这是影响朝鲜国家主权的大事。^⑨为了加强纪律检查,结合部队分散部署的实际,志愿军政治机关在部队中广泛推行“区域负责制”,按驻地情况划定区域,分别

^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总结编审小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汇编(下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811页。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449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66页。

^④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总结编委会《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几个主要问题的经验总结》,1958年,第125页。

^⑤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总结》,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第64-66页。

^⑥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总结编委会《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几个主要问题的经验总结》,第126-127页。

^⑦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总结编审小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汇编(下册)》,第811页。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55页。

^⑨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总结》,第62页。

负责维护纪律。与此同时,为便于与朝鲜人民联系,志愿军在每一伙食单位都配备了一名中国籍朝鲜族同志担任朝语联络员。这些联络员不仅向驻地朝鲜人民宣传我军政策,了解风情民俗,还收集朝鲜人民对我军的要求和反映,进行群众纪律检查,成为志愿军同朝鲜党、政、军、民联系的重要桥梁。^①

为了密切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和党政机关的联系,朝鲜方面除了在志愿军兵团以上机关派驻代表外,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在志愿军师以上机关还派驻了政治文化联络部。通过这种方式,志愿军广大官兵对朝鲜政府的政策法规、人民的风俗习惯和朝鲜的社会情况有了更深的理解;志愿军需要就地筹集或采购物资时,朝鲜方面也能够尽力提供帮助。^②志愿军某部在第五次战役中粮食供应不足,朝方派驻的政治文化联络部即主动与政府联系,“动员群众送来粮食、黄豆、洋芋、野菜”;上甘岭战役中,“派驻某军的政治文化联络部协同朝鲜地方政府组织了数千群众参加战勤,并送来大批苹果、萝卜慰问我军,解决坑道缺水困难。”^③在处理一些涉及地方政务的事情上,志愿军部分单位仍“搬用过去国内战争时期部队执行作战、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三项任务的经验,在群众中建立锄奸组织,私自清查户口,盘查行人,甚至还发生扣留当地朝鲜人民的事情”,这些都不自觉地干涉了朝鲜内部事务,触犯了朝鲜国家主权。^④为此,志愿军就特别注意发挥政治文化联络部的作用^⑤,“通过与当地政府代表的联席会、小型座谈会等形式”,“共同制定计划,由当地政府组织实施,使朝鲜政府和人民都很满意”。^⑥

(三) 中朝两军相互尊重、相互学习 不断打牢信任基础

志愿军与人民军之间的密切协作、和谐相处,是联合作战能够顺利进行的关键。为此,志愿军在入朝之前就号召各部队积极向朝鲜人民军学习,正确认识他们的优势,赞扬他们的战斗精神。对于朝鲜人民军的不足之处,要求志愿军各级指挥员从正面进行启发和帮助,避免批评指责。在1951年1月的中朝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邓华作了《对美伪军作战的初步经验》报告,详细总结了志愿军第一、二次战役的作战经验,向朝鲜人民军系统介绍了志愿军的作战心得。同时,金雄也代表朝方作了《人民军作战经验的报告》,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人民军第5军团团长方虎山等也对各自部队的作战经验进行了介绍。在平时的战斗中,两军官兵也经常利用休整间隙相互学习,共同提高战术技术水平。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第15军提出“把上甘岭变成第二个伤心岭”的口号,号召部队学习朝鲜人民军创造的“1211”高地防御战范例;志愿军第68军和朝鲜人民军在并肩作战中,向人民军学习炮打宣传弹、九〇火箭炮打坦克以及使用苏式手雷等方面的经验;人民军的战士们向志愿军学习使用重机枪、迫击炮和构筑坑道等方面的经验;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干部经常举行座谈,到人民军去参观、实习,请英雄模范来志愿军做报告等。^⑦这种在战斗中协同配合,互相支援帮助,互相学习战术技术与交流战斗经验,成为两军战斗团结的突出表现。为

^①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总结》,第72页。

^②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总结编委会《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几个主要问题的经验总结》,第141页。

^③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总结》,第70—71页。

^④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总结编委会《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几个主要问题的经验总结》,第139页。

^⑤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总结》,第72页。

^⑥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总结》,第63页。

^⑦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总结编委会《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几个主要问题的经验总结》,第148页。

了更加紧密协调一致,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从师到连都经过协议,“订出各级协同作战方案,以文字明确规定”。在协同作战方案制定后,连队还要进行“深入教育,使所有干部战士彻底了解”,并“经常检查对协同作战方案的执行情况,养成部队善于在战斗中自觉地团结朝鲜人民军的作风”。^①这种坦诚公开的经验交流,使得中朝双方进一步认识了彼此在作战上的特点和优势,通过相互学习提高了作战水平,为联合作战中实施有效协同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结 语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在两年零七个月的战争中,志愿军将士以无比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巧妙的战略战术,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强大对手,打出了国威军威,极大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这场战争的胜利,离不开中朝两国两军间的团结协作。战争期间,在毛泽东的战略指挥下,中朝联合司令部统一指挥中朝两军,密切配合,有效发挥了两军整体合力。中朝联合作战,不仅开创了中国军队在境外与他国军队实施联合作战的先河,而且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首先,中朝两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能够密切配合,离不开两党、两国、两军之间的政治军事互信。在中国革命战争和朝鲜争取独立与解放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劳动党、中朝两国人民曾经密切合作,建立了较为深厚的友谊。当朝鲜战局恶化、新中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心出兵抗美援朝,就是着眼于中朝双方的共同利益。志愿军出国作战之前,中朝两国通过建立大使级沟通渠道,逐渐密切了两国的信息沟通。在酝酿成立联合指挥机构的过程中,朝鲜领导人与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领导人以及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多次见面会谈,增进了双方了解,消除了误解和分歧,从而为最终建立联合指挥机构、实施联合作战行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中朝联合指挥机构的运转,经历了一个从初步建立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志愿军入朝初期,由于中朝双方在联合作战问题上经验和准备不足,缺乏统一协调,导致第一、二次战役期间两军在配合作战方面出现若干问题。“联司”成立后,随着中朝两国、两军间不断增强互信,联合作战指挥和联合行动逐渐顺畅,指挥体制和机制也不断完善。这也反映出两军高级指挥员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也体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

此外,志愿军广大官兵严格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切实尊重朝鲜人民和朝鲜军队,切实维护朝鲜人民利益,以严明的纪律树立良好形象,赢得了朝鲜人民和政府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也为中朝两军建立信任、并肩战斗奠定了坚实基础。

(责任编辑 尹正达)

^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总结编审小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汇编(下册)》,第834页。